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30

■ 艺术体育

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管窥^①

戴苏川

(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体育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体育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门类,形成了以体育学和历史学为主线,以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辅助的综合化研究理路。论及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的中心论题,这既来源于对我国体育史发展不平衡的归因分析,也涉及体育史学史建构的基本问题。我国体育有没有自身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关键在于探讨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缘起问题;我国体育的实践稟性是否拥有史学的居所,重点在于围绕中国体育史学史归属作出研判;当前体育学科发展史能否代表体育史全部,任务在于观瞻中国体育史学史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体育史学史;命题缘起;归属研判;前景观瞻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175-06

On the Research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iography

DAI Su-chuan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history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main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itself.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iography involve many disciplines, which have been shaped into a comprehensively theoretical research route by taking sports science and history as its main line, and other disciplines, e. g. philosophy,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sociology as its ancillary line. As far as the central thes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iography's researches are concerned, they involve both the reason analysis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y'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c issues about construction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The key to whether Chinese sports has historical context of its own in sports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analysis of origin propositions in history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The focus for whether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Chinese sports deserves historical research shall center on judgment of history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iography's attribution; The task for whether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urrent sports discipline represents the entire sports history shall rest on the view of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in history of Chinese sports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y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origin of the proposition; judgment of the attribution; a view of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① 收稿日期:2013-12-01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体、卫、艺专项(立项)”(T-c/2013/081)

作者简介:戴苏川(1984-),男,江苏南通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当代体育史基本理论与乒乓球运动史研究。

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因长期缺少史学质素,一度伴随体育事业发展以及体育哲学、文化学、社会学诸学科的兴起而颇受争议。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体育学科发展史从无到有,尤其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体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纷纷崭露头角,加之我国跻身世界体育强国的不懈努力以及国内体育经济学的强劲推动,催生并绽放出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众多门类与主要方向。由此延展了国内体育史学开始重新谋篇布局的喜人态势,但也显现出体育史学研究不平衡的理论短柄。故此提出值得反思的三道论题:首先需要回答的命题是,我国体育有没有自身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关键在于探讨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缘起问题;其次需要深化的论题是,我国体育的实践禀性是否拥有史学的居所,重点在于围绕中国体育史学史归属作出研判;再者需要追思的母题是,当前体育学科发展史能否代表体育史全部,任务在于观瞻中国体育史学史的发展前景。循此论及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的中心论题,既包括对我国体育史发展不平衡的归因分析,也涉及体育史学史建构的基本问题。

一 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缘起

体育史学研究属于理论舶来品。欧洲尤以德国拥有体育史学研究的较长历史。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人菲特就专注于世界体育史的研究,在其著作《对身体运动史的贡献》、《体育史稿》中,探讨了体育史研究重要性、体育史时代区分法、体育起源“战争说”等深刻影响体育史学研究历程的重要命题。尽管菲特为了对抗欧洲黑暗中世纪“拯救灵魂而轻视身体”的宗教律令,过于崇尚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体育竞技运动,这难免在讨论体育史起源问题上或多或少带有“言必称希腊”的味道,但他与吉勒施的研究视野都摄入了波斯体育和中国古代体育等东方体育学的要素。尤其是吉勒施著有《支那的蹴鞠和马球》,书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足球和马球游戏,这无疑为世界体育史研究开启了东方体育学的窗口。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体育史研究榜单上常见的研究者还有巴龙、伊泽林、沃伊勒等。20世纪德国的体育史研究步入兴盛时期,研究侧重于体育运动项目、体育组织以及身体文化、身体社会学等内容,并且初现出体育史学与健康医学交融的价值取向。这也可以从体育史在19世纪50年代列入德国学校体育课程,以及体育史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德国大学学科名录中得到佐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体育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这些被英国人自诩为“直到70年代才出现了能称得上是严肃历史的著作”^[1],诞生了特征鲜明的体育社会史,填补了体育与文学、英国体育传播学、英国妇女如何参与体育运动等方面的空白,形成了具有内在自觉性的英国体育史学科。1990年理查德·霍尔特出版文集《现代英国的体育与劳动阶级》,就力主英国体育史研究需要改变考虑重大成就和主导性风俗习惯的惯性思维。这一时期,曼森、贝克、沃尔温等英国体育史学家们及其追随者,也契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来回应大众对体育的关切。

体育史研究在亚洲国家更是千姿百态。由于深受国外体育史学研究的影响,亚洲国家的体育史研究也出现了跨学科诸如向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演进的趋势,呈现出向人和体育服务本身转型的趋势。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体育强国,迎来了体育史学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则更为注重古代传统体育以及体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韩国、日本、蒙古等单一民族国家则更为关注民族体育史研究。这既得益于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有力支撑,也依赖于专业学术队伍与群体的建设以及与欧美国家的交流互鉴,更离不开不断跨越历史分期并出版大量研究成果的贡献。

继而需要探究的论题,即在于我国体育有没有自身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这道论题事关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的缘起,也就是如何廓清我国体育史学研究动向及其自身历史的问题。倘若结合我国体育史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体育史研究现状,则能够明晰其鲜明的分期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史编纂均采用社会史分期法,留下了以编年方式记载我国体育思想、体育理论和体育方针政策的深刻印迹。90年代中后期,学界普遍认同以体育发展为主、社会发展为辅的分期法^[2],譬如历

时3年编纂而成,并于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就以突出适合中国国情体育发展道路为主线,以“文革”为分野,分为前3段和后3段,较好地运用了史论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长期追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体育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学科复兴阶段(1980年~1990年)”,主要围绕体育史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学界确立了“通史说”、“断代史说”、“革命史范式”等相对稳定的阐释;其次是“学科发展的间歇阶段(1991年~2000年)”,虽然没有重大理论突破,但专题性体育史论著论文连续出版,并且覆盖面很宽;最后是“反思与寻找出路阶段(2000年至今)”,出现了“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重要转折,“一是问题意识加强,其中一个共识就是从宏观性对象和范畴转向以问题为研究导向,使体育史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二是研究范围和选题都呈现出日趋多元和强劲的走向,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突破。”^[3]有研究者将我国体育史发展阶段暴露出的不平衡问题,归结为除了“急功近利的环境因素以外,人们对体育史学的认识不足以及体育史学建设中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4]在此姑且不论这样的研究内容是否全面系统,但至少勾勒并反映出我国体育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一是学界对体育史学发展规律与过程的初步探索;二是阐释体育史学在经济社会发展史的地位与作用;三是总结我国体育史学的分布、门类与经验;四是形成并借鉴体育史学发展的成果。这就为提出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及价值取向,提供了横向与纵向研究也即历史求证与实证分析的坚实基础。

二 中国体育史学史归属研判

体育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体育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史学史体系,是一项极具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也是植根学科生成的内外部条件,以及准确把握我国体育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尝试。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体育史学的发展深受社会制度变迁、社会历史演进、思想文化跃迁等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并不是以孤立状态和单一格局存在。仅仅从盛世修史的角度来阐述构建体育史学科的重要性,显然带有片面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如何确立我国体育史学史的学科地位呢?关键要回答我国体育的实践禀性是否拥有史学居所的问题,这关乎对我国体育史学史归属问题的探索与研判。

研判之一:体育史学史的生成条件相对成熟。从我国体育史学史的新兴学科特质分析,其学科地位的获得主要受到以下有利条件与积极因素的影响。一者受到内在成长性要素的作用。在历史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理论区间,我国体育史学经由古代和近代体育史研究向当代体育史学转型,先后开辟出寻根史学、反思史学、参与史学、分析史学的研究路径,这些内生要素形成并丰富了我国体育史的研究体系。二者深受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体育事业的兴盛,我国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与教育研究体系,1982年原国家体委组建了文史工作委员会,地方分支机构相继成立,开展体育史志编写与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体育史进入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专业课程设置行列,体育史专业研究生列入招生计划,大量专业期刊创办发行,1990年还建成了中国体育博物馆。三者承载我国体育史学发展需求。发展体育史学肩负着促进体育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任务,有研究者认为历史学理论的演进激发了体育史建构的需求,凸显出“从一元论向多元论的演进”、“从思辨史学向分析史学的演进”、“从伟人历史向日常生活史的演进”^[5]的态势,彰显出体育史学的历史特质并以新的研究范式渗透至我国体育史学领地。四者接受外在交融性要素的辐射。体育史研究既要调整和处理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并开辟新的研究空间,也要搭建交流传播的平台并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更要促进研究深度与广度、科学性与准确性的交融。这实质上包含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追踪和综合研究的要求,此当属体育史学史的研究范畴。

研判之二:体育史学史的学科归属亟待厘清。在探寻体育史学科属性过程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体育

史学具有双重性也即体育学与历史学交融互通的特征,这就提出了固守体育学理论还是侧重历史研究的取舍问题。如果侧重于体育学,相关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就会存在工具化的倾向,延展出以学代史的问题;如果倚重历史学,体育运动自身演进规律就容易掩埋在特征的研究程式之中,这样的体育史就会褪变为一般通史和断代史的补充。如何促进体育学与历史学的融聚,或者在跨学科视域和大体育理念中寻找找到体育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呢?说到底这关涉体育史学研究的视野,也提出了如何构建体育史学史并明确其学科归属的全新论题。当前亟需厘清的主要关系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如何调适中与西的关系,体育史学史以何为体以何为用?在研究方向上需要辨清如何驾驭遵循自身规律又能够承接世界体育史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也隐含着怎样廓清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体育及其精神的中性化而加以渗透的问题。二是如何确认主与从的关系,体育史学史有着怎样的研究主体与客体?在跨学科问题上需要澄清专门史、学科史研究的价值选向,尤其要在社会历史脉络中嵌入体育事业和运动项目发展、体育教育学演进、体育心理学发展、特定体育思想演化^[6]等关键内容。三是如何对待古与今的关系,体育史学史怎样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均衡发展层面需要明确体育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关节点在于怎样贯通不同时期体育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现实价值,逐步剔除冠以历史之名、假借体育史名头、偏离体育史学史方向的消极因素。四是如何把握史与学的关系,体育史学史怎样处理史与论的矛盾?在内容与形式层面需要克服以史代论并简单罗列和堆砌史料的现象,也要防止以学代史、以论代史预设并佐证体育史理论前提的做法。

研判之三:体育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待明确。我国体育事业经历着一条从基础薄弱逐步走向繁荣振兴的道路,这条看似“先抑后扬”的发展之路,反映在体育史研究中却是另一番镜像。尽管体育通史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体育专门史的研究起步迅速,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譬如,体育史研究对象比较繁复、研究内容日趋庞杂,研究方法各不相同,甚而存在时间跨度与空间范围难以统一的状况,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规范性没有得到充分秉持。体育史研究的不平衡现象随着许多领域诸如体育经济史、群众体育史、民族体育史、体育人物史、体育交往史研究的缺失而日益凸显。这不仅使得研究体育史学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迫切需要解决如何丰富与拓展体育史研究范畴、对象与领域的问题。由此论及整体构建体育史学史的论题,这项系统化的研究工作需要根据其研究对象特点和新兴交叉学科特征加以推进,可以梳理为以下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构建体育学科史,此为发展体育史学史的支撑条件,其研究分支项目主要包括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史(竞技体育史)、体育运动心理学史、体育教育研究史、体育专业队伍建设史、体育运动组织发展史等。二是丰富体育思想史,此乃提升体育史学史研究水平的理论基础,其研究类别和方向主要涵盖体育哲学史、体育伦理学史、体育文化史、学校体育史等。三是主攻体育社会史,这是促进体育史学史均衡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其研究选向和重点涵括体育经济史、民族体育史、体育人物史、群众体育史、社区体育史、农村体育史、城市体育史等。四是完善体育发展史,这是形成体育史学研究体系的主要内容,既需要继续推动体育通史、体育断代史的基础性研究,也要拓展民族体育史、区域体育史的研究空间。上述四方面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但对于克服体育史研究不平衡问题,全面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史学史主骨架,亦可谓一种理论尝试。

三 中国体育史学史前景观瞻

体育史学史研究作为一道全新命题亟待破解。在考证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的重要性及其归属问题之后,尤须审慎思考的是,当前体育学科发展史能否代表体育史全部,我国体育史学史具有哪些研究范畴呢?可以肯定地回答,研究我国体育史学史涉及众多学科门类,形成了以体育学和历史学为主线,以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辅助的综合化研究理路。经纬交错的研究图景,既表明我国体育史学蓬勃发展需要遵循并贯穿史学史的基本要求,也转向了体育史学史如何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实际

相结合的广阔空间。我国体育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已经初现端倪,这能够在其文献编纂的过程、基本内涵与观点的阐释中加以确证。

第一,丰富鲜活的史料素材奠定了体育史学史建构的基石。体育史学史专注于研究体育史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样式,自然离不开体育史的专题化研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体育史的文献编纂蔚为大观。一是史料不断丰富扩容。1984年原国家体委体育开始编纂出版《当代中国体育》,这是第一部全面介绍新中国体育史的著作。1986年原国家体委决定编纂《中国体育新单项运动史丛书》,填补了新中国专项运动史研究的空白。1999年体育文史委编纂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标志着新中国体育史进入系统化研究阶段。二是专著力作纷纷问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体育史教材和著作注重社会分期研究。1989年刊行体院本《体育史》,1996年出版高教本《体育史》,1990年颜绍沪和周西宽著有《体育运动史》,1996年谷世权撰写了《中国体育史》。新世纪以来,体育史研究进入繁盛时期。2000年王俊奇著述《中国唐宋体育史》,2003年谷世权著有《中国体育史》、易剑东著有《中国体育经济史》,2008年李润波撰写成《中国体育百年图志》,2009年王俊奇出版《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杨祥全、杨向东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三是研究空间日趋开阔。一批专题和跨学科研究成果丰富了体育史学园地。其中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2000年徐永昌的《文物与体育》、2004年韦晓康的《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2008年王俊奇的《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等^[7]。这些学术文献与成果,为深化体育史学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由此发轫,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开始从单项走向多维,从综合走向具体,从零散走向聚合,并显现出契合中国国情、反映实践特色、融入世界潮流的基本格调。

第二,灵活应变的方式方法扭转了体育史学史探究的困境。体育史学史研究正是因为蓄积了历史学理论转型与革新的动能,才形成了史学观念渗透与跨学科研究双向互动的基本特征。首先,观念反思凝聚成理论热点。研究者善于借助体育史学史的宏阔视野,能够更为深刻地反思体育史的价值功能、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基本研究方法的适用性等问题,从而唤醒建设体育史学科的自觉意识;借助体育史学史的整体化研究,能够正确看待体育史研究跌宕起伏,在兴盛时期发掘理论短柄,在危机期或间歇期发现学科成长因素和新研究方向。其次,研究弱项转化为主攻方向。体育史学史发展伴随体育史研究不平衡状况的调整而演进。今天的研究者已经能够正确看待世纪之交体育史发展不平衡现象,充分认识到产生体育史学史研究空白的主客观原因。他们针对竞技体育史发展不够完善、群众体育史和农村体育史存留空白、少数民族体育史发展失衡、中国传统体育的当代价值挖掘不深等研究弱项,选准研究弱项并凝练出新的探究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本领恐慌与研究缺憾,推动体育史学史整体化建设步伐。再次,封闭状态嬗变为开放心态。决定体育史学史学科地位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提升研究者体育学理论水平并塑造其历史意识与史学素养。体育史研究长期存在的封闭状态已经随着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渗透而大为改观。研究者认识到历史学者加盟体育史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体育史学的协同创新,而且能够培育并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这对于体育史学史的建构无疑是一场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彻底变革。

第三,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加速了体育史学史研究的进程。我国体育史学史基本内涵的阐释与思想观点的塑造,离不开体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境域,也不能背离我国体育史研究的现实条件,尤其是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在体育史学史研究中的作用。我国体育史学史所形成的鲜明价值取向主要涵括以下方面:一是体育全球史观的兴起。全球史观倡导从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学维度去考察和研究世界史,集中反映出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动态进程。全球史观与我国体育史学史的结合,既彰显出从发展趋势性以及整体性研究体育史的全新价值取向,也开启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国际体育赛事与交流、民族体育交往等专门史的研究窗口,尤其创建了编纂世界体育通史的新框架。体育全球史观的兴起,重点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国内体育史研究的单一格局,要克服欧洲体育中心论、西方体育中心

论的影响,在价值观念上剔除西方体育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包容互鉴中发扬中西方体育文化,在研究风格上形成中国体育史学史的话语体系。二是体育寻根史学的延展。寻根史学秉持从历史深处探求社会变迁的机理与规律,当属追根溯源式的、内敛型的史学观。我国体育传统与文化遗产丰厚且享誉世界,体育史研究与体育文化保护密切协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体育寻根史学研究占据了我国体育史学史的重要份额。当前,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能以现实意图来量身定做体育史,更不能以古代体育传统和历史缺乏实用价值而加以冷落。这不仅缘于研究和开发我国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意义重大,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而且因为体育史研究本身就需要解决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任务。三是体育参与史学的走向。参与史学主张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融合并持守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的学术风格,当属外向型和开放式的史学观。作为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趋向,参与史学更为关注体育史与体育实践的关系,凸显出中国体育对世界体育的贡献。张西平等人就悉数了鲍明晓探讨“国外体育产业的起源”、谭华述评“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以及程大力编著“体育文化历史论稿”的研究方向,并且认为“一些体育史学者对与当代中国体育的改革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问题做了富有创造性见解的研究”^[8]。藉此表明,体育史学史善于总结我国体育史与体育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能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体育发展史的垄断地位和既有模式,促进传统体育思想的现代转型,促成体育史研究成果更为深入地参与现实生活,从而推动体育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

参考文献:

- [1] (英)杰弗里·希尔. 英国体育史——后现代主义的未來[J]. 朱悦,译. 体育文史,1997(4):50-53.
- [2] 胡泓. 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1):17-19.
- [3] 王俊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史研究评析[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8):1-4.
- [4] 崔乐泉. 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体育文化导刊,2002(1):39-41.
- [5] 郎净,孟钟捷. 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论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J]. 体育文化导刊,2005(2):33-35.
- [6] 周景晖.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3-70.
- [7] 王俊奇,李舜慧. 当代体育史研究的新趋向[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1):46-50.
- [8] 张西平,彭暎. 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思想变迁[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6(5):24-28.

(责任校对 朱正余)